

新书掠影

茶从中国传入英国之后,究竟对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哪些影响?中英茶贸易往来又对作为生产端的中国设计产生了何种影响?本书以茶为媒介,探讨设计在文化传播和文化形成中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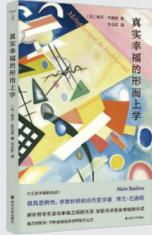


《茶杯里的想象: 18世纪中英茶叶贸易与设计文化交流》张弛著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本书对肖像艺术的历史进行了清晰而全面的概述,提供引人入胜的细节,并回答了诸多关键问题:几个世纪以来,肖像艺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肖像作品是如何表现它们的问题,又是如何被解读的?

《肖像艺术》[英]希勒·韦斯特著 金雨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在这部简短而有力的作品中,巴迪欧以一种生动的方式辨析哲学生活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深入浅出地厘清“哲学的任务是什么”?呈现寻求真实幸福的方式。

《真实幸福的形而上学》[法]阿兰·巴迪欧著 刘云虹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3年2月出版



作者从空间、物质、人物着眼,考察一个东北工业城市具体层面上的景观与抽象意义上的城市内涵。那些生长的、消失的事物,正蕴藏着我们未曾仔细了解的现代精神、属于中国城市的现代精神。

《现代精神之花: 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徐前进著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23年1月出版



作者是动物伦理和神经科学领域的专家,研究人类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本书巧妙地结合了医学、社会史和个体经验,展示了人类和动物的安康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伴生》[美]阿丽莎·阿赫塔著 小庄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11月出版

书人茶话

从历史学角度重新审视“平庸之恶”

张弘

纳粹德国的高官阿道夫·艾希曼1942年出席万湖会议,被任命负责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并且晋升中校,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都是由艾希曼负责。二战中,艾希曼被美国俘虏,之后逃脱,并流亡到阿根廷。1961年,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摩萨德查出艾希曼的下落,将其逮捕,带回耶路撒冷受审,以人道罪名等15条罪名起诉。1962年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

因为艾希曼,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

艾希曼受审之时,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译林出版社出版)。汉娜·阿伦特描述审判席上的纳粹党徒艾希曼:“不阴险,也不凶横”,完全不像一个恶贯满盈的刽子手,就那么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接受绞刑。他甚至宣称,“他的一生都是依据康德的道德律令而活,他所有行动都来自康德对于责任的界定”。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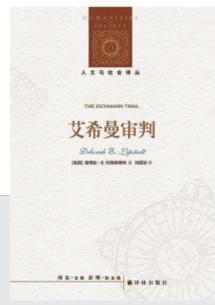
据此,汉娜·阿伦特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这种恶是不思考的,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恶是平庸的,因为常人都可能堕入其中。把个人完全同化于体制之中,服从体制的安排,默认体制本身隐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行为,甚至成为不道德体制的毫不质疑的实践者,或许有些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凭借体制来给自己他者化的冷漠行为提供非关道德问题的辩护,从而解除个人道德上的过错。这就是现代社会和体制化之中个人平庸之恶的基本表现。

其后,因不思想、无判断、盲目服从权威而犯下的罪恶一直是人们讨论和引用的概念,同时也启发个人思考作为人应该有的品质,以及从灵魂深处反思自己。它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美]汉娜·阿伦特著 安尼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 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德]贝蒂娜·施汤内特著 周全译 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



《艾希曼审判》[美]德博拉·E.利普斯塔特著 刘颖洁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现代性与大屠杀》[美]齐格蒙·鲍曼著 杨渝东 史建华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恶可以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是本质的。

阿伦特为什么会为艾希曼辩护?

从哲学上说,阿伦特抽象出的“平庸之恶”有其深刻的一面。如果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否能归于“平庸之恶”,则需要探讨。阿伦特将艾希曼看做一个服从命令的公务员,庞大体系运转中的一个小小齿轮,几乎没有思想,“从未意识到自己做了些什么”,没有真正理解他被卷入其中的计划。但是,《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 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杀刽子手》(北京日报出版社出版)一书显示,真相并非如此。该书作者贝蒂娜·施汤内特全面分析了艾希曼本人写下的1300多页日记,以及他20世纪50年代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每周举办的纳粹沙龙上留下的73卷录音带,据此描绘出艾希曼令人恐惧的面目:他是一个老练世故的操控者,一个不思维

改的谋杀犯。他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始终伪装自己,渴望有人追随他,与他一起讨论昔日“荣光”,同时还与其他类似的亡命之徒一起狂热地计划未来目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时的表演,只是想保住自己的性命。贝蒂娜·施汤内特认为,阿伦特做出“平庸之恶”的判断,是因为当时能够接触到的资料太少。

而新近出版的美国历史学家德博拉·E.利普斯塔特的《艾希曼审判》(译林出版社出版)一书,更是颠覆了阿伦特的看法。艾希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写下了一份回忆录,他被处决以后,回忆录手稿被封存在以色列国家档案馆。上世纪90年代后期,艾希曼的一个儿子要求公开出版手稿。作为大屠杀的研究专家,德博拉·E.利普斯塔特得到了这部手稿的打印本。在最新公开的回忆录中,艾希曼称自己是根深蒂固的纳粹分子与反犹主义者,他视其纳粹领导人为“偶像”,全心全意为他们的目标而奉献——显然,这绝非“平庸之恶”,而是穷凶极恶。《艾希曼审判》揭示,艾希曼的审问官阿夫纳·莱斯曼发现,艾希曼会“一直撒谎,直到有记录可依的证据打破”。无论何时,当艾希

曼激动地抗议,某些事不是真的,那么它很有可能就是真的。

德博拉认为,西方文化中长期存在根深蒂固的反犹主义历史,这是纳粹大屠杀的基石。

显然,这不符合齐格蒙·鲍曼的《现代性与大屠杀》(增订版,译林出版社出版)一书的观点。在鲍曼看来,“被统治者的理性,往往是统治者的武器”。鲍曼的分析认为,大屠杀是一些各自存在的现代性因素结合起来的结果:强有力的政府、战争掩护下的借口说辞、庞大有效的官僚机器,以及技术官僚的行为模式和心态。在鲍曼看来,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需要无条件承担道德责任。

鲍曼对个体道德责任的强调,发展了阿伦特的观点。但是,鲍曼关于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关系的观点,或许还需要进一步的考察。例如,明末张献忠祸蜀,至少杀死了30-60万人。这种大屠杀发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就与现代性关系不大。尽管如此,我仍然同意鲍曼的观点:在任何情况下,个体都需要无条件承担道德责任,不能做只有工具理性的“工具人”。

好书过眼

近代江南乡村建设研究的开拓之作

——《改造乡村中国——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评介

张生

设的深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再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持续研究。朱庆葆教授等所著《改造乡村中国——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一书,选择以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建设实践,为学界奉献出近代江南乡村建设史的另一力作,拓展了学界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路径。概而言之,该书在以下三个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研究特色。

首先,填补了民国乡村建设区域研究的一大空白,拓展了民国乡村建设史的研究视野。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开始对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重新审视并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在这些研究中,有的以整个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为考察对象,有的以某一个实验区为考查范围,有的则专门考察乡村建设举措的某一个专项。同时,这些研究尤以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区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区为考查重点。然而,系统考察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还是空白。长江三角洲地区自古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的近代历史不仅从这里开始,而且在这里结束。在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长江三角洲地区汇集了多种社会力量,举办了多种不同模式的乡村建设实验,俨然是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一个缩影。然而,学界到目前为止,尚无专门著作对这一区域的乡村建设运动加以探讨。《改造乡村中国》选取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江宁、乌江、徐公桥等乡村建设实验区为考察对象,尽最大可能复原民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运动的本来面目,厘清这场运动的起因、过程、效果,从整体上考察其间的关联与互动,尚属学界首次。

以长三角区域为研究对象,既可以最大程度地接近整体,解除以全国范围为研究对象面临的史料、精力方面的限制,又可以突破特定实验区的限制,便于探讨各种模式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对于丰富民国乡村建设史乃至整个中华民国史的研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拓展新的研究路径。《改造乡村中国》一书一个鲜明的特点是特别注重史料的多元性,把研究建立在各种不同类型的证据基础之上。这些不同类型的证据包括档案与资料汇编、报刊资料、地方志资料及调查报告、文集与文史资料等等。在多元性史料的基础上,该书将个案研究和整体研究相结合,将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相结合,既以徐公桥、江宁、乌江等乡村建设实验区的个案研究为基础,又突破实验区地域限制,在整个长三角地区内进行中观探析,通过与全国其他实验区的比较形成对这场运动的宏观把握。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既可通过具体而微的个案研究归纳出最为接近历史真实的宏观判断,又可将这些个案组成的中观区域再次置于个案的位置,进行二次探讨,检视宏观整体性判断的普遍性。这样的研究真实再现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多样性,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避免了许多论题仅从一个实验区的角度去下结论存在的困难。这种研究路径有助于深化对整个长三角地区乃至整个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体认识。

再次,借助多学科方法深入诠释长三角乡村建设实践,提出具有创新意义的新论点。《改造乡村中国》一书将长三角地区的乡村建设运动放到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通过宏观纵

向历史视角和横向对比视角的考量,从个性中寻找共性,从共性中探求规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挖掘这场运动自身的发展脉络与内在意蕴。在对江宁、乌江、徐公桥等实验区进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该书从动机、内容、效果等角度对不同实验区的乡村建设实践进行模式比较,并从价值维度加以考量,对长三角地区乡村建设实践做出了客观深入的认识和评价。长三角乡村建设实践表明,近代工业的发展未必以破坏传统经济为前提,近代工业可以与传统手工业、农业协调发展。中国的城乡未必必要对立,工农未必必要相互分离。在中国,农业与工商业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工商业与农业的相互协调完全可以避免农村危机的出现,可以解决后发现代化国家从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中面临的诸多问题。中国应该转变观念,走城乡统筹、工农结合的发展道路,以工业带动农业的发展,以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关照“三农”。这些认识对于我们加深对乡村问题的理解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价值。

意大利史家克罗齐曾经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这意味着过去只有和当前的视域相重合的时候,才为人所理解。只有通过过去才能理解过去,也只有通过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作为近代江南乡村建设史研究新出的一部力作,《改造乡村中国》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体实践,帮助学界同仁拓宽民国乡村建设史的研究视野和研究路径,而且对于理解当代中国正在全面推进的乡村振兴战略,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意蕴。

(本文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改造乡村中国——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朱庆葆 王科 崔军伟 牛力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近代中国城乡社会的变迁是传统中国的历史延续,但却不是简单的历史重复,而是在近代中国整体嬗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是中国近代转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在坚持民族性和本土化的基础上,又体现出多样性、开放性和国际化的多重特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农村复兴”的口号弥漫于全国,各种建设农村的机构纷纷设立,风起云涌,桴鼓相应,可谓盛况一时,由此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实验区有1000多处。这场运动持续十余年之久,波及中国中东西部广大地区,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三味书屋

《访书记》是作者崔莹博士与51位海外学者和作家的对话集集,目的在于了解他们创作的心路历程和背后故事。读毕该书,却被该采访录所涉及主题之广泛——覆盖了汉学、世界史、文学、非虚构、社会学和流行文化六个主题,所访谈对象身份之多元——包括汉学家、世界史学家、社会学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官、殡葬师、时装模特、漫画家等,以及完成这些访谈所需要付出的劳力和心力等所深深折服。

崔莹以其全球主义的眼光和文明互鉴的视野将这些作者与其书背后细腻而磅礴的天地一一呈现给读者。书中每一篇访谈兼具严谨的学术意识和深入浅出的叙述语调,既厚重又轻盈,任何的人文社科爱好者都能从中找到与自身兴趣契合的篇章。

从崔莹与海外汉学家们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汉学家们是如何致力于让西方民众了解一个更真实的中国,并且搭建起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的。书中,崔莹与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就其书《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的对话让人印象深刻。卜正民在牛津大学的图书馆邂逅一张充满欧洲元素的沉睡了300多年的中国明代地图,通过对蛛丝马迹的推测和考证,卜正民重新发掘了沈福宗这位地图的注释者,他同时也是第一个到英国的中国人。这张地图的创作和流通的背后隐藏的恰是一段被忽略的明朝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史。在崔莹与汉学家宇文所安的对话中,我们又重新认识了杜甫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宇文所安对唐诗研究熟稔于心,他用八年时间翻译了杜甫诗全集,正是他的杰出翻译使得杜甫及其作品可以跨越语言、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进入世界文学流通的市场,使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诗人得以被世界所知。宇文所安认为杜甫是中国的莎士比亚,他不仅代表过去,也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时代,因为无论文化和价值观如何变化,每个时代的人都能从伟大的作者身上找到属于自己时代的内容。

当然,崔莹的着眼点不仅在于世界中的中国,她的眼光放诸全球文学和文化,这既包括英美国家的作者,也包括少数族裔的作者。如来自肯尼亚的后殖民主义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他自认为是“肯尼亚人、非洲人和全球主义者”,毕生致力于“以书写进行文化抵抗”。事实上,恩古吉的写作正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从而为非洲作家在世界文学场域中争得一席之地。另外,在崔莹与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的对话中,我们从其“朱鹭号”三部曲中重新发现被历史学家忽视的印度在英国对华走私鸦片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难得的是,高希为了写作三部曲,曾多次来中国调研,去过广东多家和鸦片战争有关的纪念馆,甚至还专门学了粤语。他坦言深受沈从文的《浮生六记》和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影响。至此,我们又窥见了中外文学文化之间交流汇集、相互阐发、互相影响的影子。

在崔莹与美国女作家加布瑞埃拉·泽文的对话中,后者谈到只有成为好的读者,才能成为好的作者。如此说来,崔莹首先肯定是一位好的读者,因为要采访一位作者,至少要读其好几本作品,而且要带着问题意识去读,同时还得了解这些作者所处的文化和社会背景,这其中的阅读量可想而知。崔莹以其多年在国外旅居的优势、对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碰撞和融合的悉心感受,以及其作为专业新闻工作者的素养,完成了这51篇访谈,向读者奉上了一场跨文化的、丰富多元的阅读盛宴。在此意义上,她也是一位好的作者。

读毕合上书,再回看书的封面是一幅星云图,我一下子想到崔莹与王德威教授对话的那一章,提到其编写《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时采用的德国社会学家勒佩尼斯发明的“星座图”写法,每篇文章只写一个时间点,讲一个故事,然后将150个不同的时间点汇集成一天的“星座图”。这是因为“历史有时候像是长江大河,也像天上闪烁的星星,只有特别敏锐的摘星者才能把星座描绘出来,否则就是一天空的繁星”。这样一想,崔莹又何尝不是那个摘星者,而《访书记》就是她给读者画出的星座图呢?

摘星者和她给读者画出的星座图

陈华菲



《访书记》崔莹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佛中国史》主编、汉学家卜正民教授

哈佛大学荣誉教授、汉学家宇文所安

肯尼亚作家、比较文学教授恩古吉·瓦·提安哥

印度学者、作家阿米塔夫·高希